

感佩不已。难怪黄庭坚曾这样评价王安石：“余尝观其风度，真视富贵如浮云，不溺于财利酒色，一世之伟人也。”

正因为王安石理想远大、意志坚定、情操高尚，所以他的诗词也呈现出一种清气逼人、境界高远的格调。尽管他在政治上的新措施引起同时和后世许多人的敌视，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他在文学上的成就。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，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。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，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，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。他反对西昆派杨亿、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，认为“所谓文者，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。所谓辞者，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。诚使巧县华，不必适用；诚使适用，亦不必巧且华。要之以适用为本，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”（《上人书》）。正因为王安石以“务为有补于世”的“适用”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，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、反映社会矛盾，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。

诗文主革新

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王安石的散文，雄健简练，奇崛峭拔，大都是书、表、记、序等体式的论说文，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，为变法革新服务。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，观点鲜明，分析深刻，长篇横铺而不力单，短篇纤折而不味薄。《上仁皇帝言事书》，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，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，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，表现出作者“起民之病，治国之疵”的进步思想。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》，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，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，认为“大有为之时，正在今日”。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新政，无疑吹起了一支前奏曲。《答司马谏议书》，以数百字的篇幅，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四事，严加剖驳，短小精悍，言简意赅，措词得体，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。

王安石的政论文，不论长篇还是短制，结构都很谨严，主意超卓，说理透彻，语言朴素精练，“只用一二语，便可扫却他人无数大段”（刘熙载《艺概·文概》），可以看出其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性，思维缜密，善于雄辩。而他的一些小品文，则清新雅致，脍炙人口，《读孟尝君传》、《伤仲永》等



王安石《元日》诗意图，戴敦邦画。

评价人物的文字，笔力劲健，文风峭刻，富有感情色彩，给人以显豁的新鲜感。而《城陂院兴造记》、《游褒禅山记》等文字，简洁明快，亦记游，亦说理，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，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、形象，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，显得布局灵活而又曲折多变。

应该说，王安石文学成就最高者在诗。对此，钱钟书在《宋诗选注》中曾有这样的评价——王安石的诗无论在声誉上、在内容上或在词句的来源上都比西昆体广大得多。痛骂他祸国殃民的人都得承认他“博闻”、“博极群书”；他在辩论的时候，也破口骂人：“君辈坐不读书耳！”又说自己：“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‘难经’、‘素问’、‘本草’、诸小说无所不读。”所以他写到各种事物，只要他想“以故事记事实”都可以做到，而所谓“用事”不是“编事”，是“须自出己意，借事以相发明”；这也许正是唐代皎然所说“用事不直”，的确就是后来杨万里所称赞黄庭坚的“妙法”，“备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”。

王安石的诗歌，大致可以罢相（1076年左右）划界而分为前、后期，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。“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，故诗语惟其所向，不复更为涵蓄……后为群牧羊官，